

1951年的元旦

□ 贾可宽 贾永

这是新中国第二个元旦。
瑞雪过后，朝阳初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将新的一年第一天的人民日报社论，传向四面八方——
“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两个多月的英勇作战，证明了甚至在设有飞机坦克和很少大炮的条件下，‘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军队也是可以击败的……因此，当我们进入1951年的时候，帝国主义对于我们的侵略虽然还没有停止，我们却是满怀信心地面向着光明的将来！”
这篇题为《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的元旦社论，毛泽东亲笔审阅修改了多处。激扬的文字，如同澎湃在志愿军心中的战斗激情。

此时此刻，第三次战役已经打响13个半小时。漫天飞雪中，成千上万的志愿军官兵以雷霆万钧之势，突破20万“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把守的三八线。
东京帝国饭店10楼，“联合国军”总司令办公室。接到志愿军打响第三次战役的报告，麦克阿瑟大吃一惊。他无法想象，中国军队会在经历了一场残酷大战仅仅一周，就再次发起规模浩大的进攻之战。并且，是在远离后方支援的情况下。

第二次战役的伤亡数字，摆在麦克阿瑟的案头：这一战，“联合国军”付出了伤亡和被俘3.6万人的代价，其中美军2.4万余人；各种炮1100余门、汽车3300余辆、坦克与装甲车200余台，被志愿军击毁或缴获……美国国内的谩骂和国际舆论的抨击，让头顶着“军神”光环的麦克阿瑟，几乎在一夜间跌入了低谷。

麦克阿瑟清楚，与美军相比，志愿军不仅武器装备过于悬殊，后勤保障更是有天壤之别。他的士兵每天可以领到净重227克的3个Meat系列罐头和3个Biscuit系列罐头，前者以肉类为主，包括肉食、蔬菜等搭配；后者以饼干为主，包括糖果和咖啡、可可粉或柠檬粉等速溶饮料……还配有口香糖、巧克力、火柴、香烟、餐巾纸等等。即便如此，他的穿着鸭绒服的陆战一师仍然在长津湖冻伤了7000多人，何况缺衣少食的中国军队？
麦克阿瑟以一个职业军人的直觉断定，既然他的“圣诞攻势”被中国人粉碎——美国陆军遭受了从未有过的“最大败绩”，那么，中国军队肯定也会损失惨重。麦克阿瑟不想让自己的一世英名毁在朝鲜战场。1950年12月23日，沃克身

亡的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命令美国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以尽快挽救战场颓势。杜鲁门政府同样也不甘心惨败于年轻的新中国，一边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让美国人民为朝鲜战争“做出任何必要的牺牲”，一边在联合国玩弄假谈真打的阴谋，企图争取时间，扩充军备，卷土重来。
这一切，自然逃不出毛泽东的如炬目光。还在二次战役期间，毛泽东就敏锐意识到，随着敌人速战速决图谋的破产，美国与其仆从国之间的矛盾会更加尖锐，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也会更加高涨。在这种背景下，只有乘胜而战，再给敌人致命一击，才有可能把敌人彻底逼到谈判桌上——否则，一旦让对手得以喘息，以英美等国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志愿军必将面临更大的战场压力。

乱云飞渡仍从容。无论逆境还是顺境，久历战火的毛泽东早已风轻云淡了。1930年元旦，当时的“朱毛”红军不过万人，毛泽东看到的却是“风展红旗如画”的前景；1949年元旦，解放战争的胜利曙光就要到来，毛泽东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告诫全党勿做古希腊寓言中那个怜悯毒蛇的农夫。打完第二次战役，“联合国军”已经败退300公里，沦陷了49天的平壤重回朝鲜人民手中，但毛泽东还需要一场新的胜仗，巩固和稳定战场态势。

新年来临的那段时间，中南海与朝鲜前线之间的电波格外密集，一封封电报直指一个目标：打过三八线！

宣将剩勇追穷寇。毛泽东所追求的，除了军事上的胜利，还有政治上的主动。他之所以下决心打赢这场立国之战，就是要用正义之战为新生共和国的和平奠基，让世界重新认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从1950年10月25日打响第一次战役，到12月24日第二次战役结束，志愿军已经在饥寒交迫的条件下，浴血鏖战了整整两个月，但毛泽东坚信，这支跟随他从长征，从抗战，从解放战争战场上一路征战而来的大军，有力量、有信心再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这种力量，来自志愿军进发的血性，同样也来自他们身后的祖国。那个冬天，中国北方几乎每一座城市都会在傍晚时分，散发出一种淡淡的混合香味，那是每家每户在为前方的志愿军做炒面。连日理万机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也出现在了炒面的队伍中。

1950年12月26日，56岁的李奇微匆匆赶赴朝鲜战场。美军高层专门为这位新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官增加了一个头衔：“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指挥官。上任伊始，李奇微专程飞到东京拜见麦克阿瑟。李奇微问：“您对我上任后，立即实施进攻有无反对意见？”麦克阿瑟拍拍李奇微的肩膀说：“第八集团军是你的，马修！你认为怎样好就怎样干吧！”他提醒李奇微：“从清川江撤退下来的美军正据守三八线一带，部队疲劳，士气不高。”

果然，当踌躇满志的李奇微视察了他的部队后，猛然发现自己的心情远比朝鲜的严冬还要阴冷——接连遭受志愿军重创的美第八集团军，已经蒙上了厚厚的心理阴影。李奇微悲哀地承认：“这是一支张皇失措的军队，对自己、对长官都丧失了信心，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我视察过的每一个指挥所都给我以同样的感觉，即丧失了信心和斗志。”

无奈之下，李奇微不得不放弃转入进攻的打算，快速部署13个师又3个旅进行防御，企图阻止志愿军继续南进。李奇微还玩了一个心眼，将南朝鲜8个师部署在第一线，把美军和英军放在二线，以便可攻可防、随时撤退。然而，令李奇微不曾料到的是，他的西起临津江、东达东海岸的基本防线刚刚部署完毕，志愿军的炮火急袭，就伴着飞舞的雪花开始了。

1950年12月31日17时，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按预定计划发起被美国人称为“除夕攻势”的第三次战役。

黄昏血色，天寒地冻。“中国军人浑身挂满冰凌，还在顽强地冲锋”，在美国作家约翰·托兰眼中，朝鲜战争远比他经历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残酷，志愿军远比他在欧洲战场上见到过的各国军人坚韧。他在《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写道：“中国军人唯一的防冻措施，不过是用猪油和牛羊板油把脚糊住以防冻伤，但他们却展现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勇气和意志力。数十万官兵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下，徒步跋涉雪原冰河，穿越弹幕火海……”

旧中国曾经在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当过副连长的李奇微显然没有意识到，新中国的军队如此无畏，更没有想到“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对志愿军如此畏惧。不过一昼夜间，南朝鲜第一、第二师全线崩溃，汉江以北美第一、第二军陷入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刚刚在元

旦清晨向麦克阿瑟发出新年贺卡的李奇微目睹这一幕“深感震惊”：“我试图阻止，可是逃跑的卡车毫不减速地闪过了我。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我向上帝祈祷，不要再目睹这样的情节。”美国随军历史学者亚历山大·贝文写道：“第八集团军已如惊弓之鸟，撤到三八线以南，来到了西边开城以南冰天雪地的临津江畔……主动权已经完全操在了中国人手里。”

1月2日，李奇微下令放弃汉城。撤退之前，他在办公室的墙壁上给彭德怀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谨向中国军队司令致意。
也就是在这一天，周恩来忍着悲痛将一个再也不忍隐瞒的消息报告毛泽东：1950年11月25日，美国战机轰炸志愿军司令部，毛岸英牺牲——彭德怀发来的电报已经被周恩来压下了一个多月，这封不到30个字的电报，彭德怀写了一个多小时：“今天，志愿军总司令部遭到敌机轰炸，毛岸英同志不幸牺牲。”

毛泽东久久沉默，直到抽完第二支烟，才发出一声叹息：“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得关系，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两天后，志愿军占领汉城。又过4天，第三次战役结束。是役，中朝两军毙伤俘敌1.9万余人。至此，志愿军三战三胜，彻底扭转朝鲜战局。

李奇微后来成了志愿军最难缠的对手，但此刻，却不得不接受眼前的现实。

从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国际舆论就不断发问，中美两国国力悬殊，刚刚从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新中国，靠什么对抗强大的美国？朝鲜战场上的美国兵同样难以理解：面对空中的炸弹、凝固汽油弹和火箭弹，面对地面坦克和榴弹炮的火力，“在尖利的军号和哨子声中，如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攻击”的中国军人，为什么能够镇定从容地迎着死亡冲锋？

也许，从毛泽东亲自修改的1951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就不难找到答案，这就是——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

（摘自2021年12月31日《解放军报》）



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带领下，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江西省南部地区，以4万余人粉碎国民党军10余万兵力的“围剿”，共歼敌1个师部、3个多旅1.5万人。此役，是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的第一个战役。中央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确定了中央苏区的革命中心地位，创造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典范。

因敌施策，积极备战。随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和苏区数量的不断增加，1930年8月下旬，蒋介石急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在汉口召开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确定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别“围剿”各苏区红军的总方针。1930年10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战胜冯玉祥、阎锡山后，迅速抽调兵力，计划在3至6个月内消灭红军，并令驻江西的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组织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基于敌强我弱、敌大我小、苏区尚未巩固的客观实际，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10月30日，总前委在罗坊会议上通过了这一方针，并决定红军主力东渡赣江，采取“主动退却、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法，在地形、群众条件较好，便于后续发展的赣江以东地区，歼敌于运动之中。据此，中央苏区党、政、军、民迅速行动，抓紧进行政治动员、实行坚壁清野、部署游击战、建立支援红军作战组织等反“围剿”准备工作。

保存实力，待机破敌。11月5日前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以红3军留在赣江西岸监视敌军，亲率红3军团、红1军团第4、12军等主力部队从袁水流域东渡赣江，向苏区北部地区转移。

11月5日，鲁涤平指挥的7个师1个旅编为3个纵队，“并进长追”至袁水流域，均因红军已先期转移而扑空。在得悉红军主力东渡赣江的消息后，遂又向赣江以东推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为保存实力，红军以少数兵力配合群众武装迟滞、消耗、疲惫、迷惑敌军，主力则于11月中旬分别从赣江以东逐次向苏区中部地区转移，抓紧整训和筹措给养，隐蔽待机。

11月18日，敌军的“尾随追击”再次扑空，又无法抓住红军主力，遂就地转入“清剿”。为彻底“剿灭”中央苏区，12月7日，蒋介石亲临南昌坐镇，将“围剿”兵力增至10万余人，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由鲁涤平兼主任统一指挥各部，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计划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由北而南向中央苏区进攻。

集中兵力，适时反攻。针对国民党军11个师2个旅分17个方向实施“围剿”的实际，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敌防御线太长，间隙过大，兵力分散，且敌军派系复杂，协调困难。经缜密分析研究，毛泽东认为战场态势已利于红军转入反攻，遂决定采取集中兵力、中间突破、割裂部署、各个击破的战法，就近歼击敌军主力。12月2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集中至黄陂、麻田地区隐蔽待机，抓紧进行政治动员和临战准备，同时命令红12军第35师赴兴国东北地区严密监视敌军，并想方设法诱敌西进。

国民党军因进军途中屡遭红军小股分队和地方武装的袭击、阻击，交通运输线常被阻断，进展迟缓。28日，进至苏区腹地的敌军5个师向红军发起总攻，张辉瓒率领的第18师以1个旅留守东固，以主力向龙冈孤军冒进。红一方面军当即决定以少部兵力牵制北面之敌，集中主力力求歼敌第18师主力于运动之中或立足未稳之时。随即各部队秘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密开进，迅速形成“正面攻击、断敌增援、击敌侧背、穿插迂回、翼侧警戒”的战役合围态势。

30日9时许，敌第18师先头第52旅进到龙冈以东小别附近地区，突遭红3军第7师迎头痛击。张辉瓒自恃兵力、兵器占优，先以2个团、后以4个团的兵力向红军实施多路猛攻，均被击退。此时，红4军和红3军团已穿插至敌第18师侧后，切断了敌从西、北方向实施增援和龙冈之敌向西、北方向突围的道路。16时，红一方面军完成了对第18师主力的包围，并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对敌发起总攻。激战至18时许，全歼敌第18师师部及其2个旅，活捉了敌第18师师长张辉瓒。

敌第18师主力被歼后，深入苏区的其他各路敌军闻讯退缩。红军乘胜追击，于1931年1月3日，在东韶附近地区，歼灭敌第50师1个多旅。随后，各路敌军争相撤离苏区。至此，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被粉碎。

闻听前方捷报，毛泽东诗情勃发，创作了诗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摘自2022年1月20日《中国国防报》）

青年刘伯承两次率部“下川东”

□ 吕传彬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死于北京。6月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重庆镇守使兼五师师长，派刘伯承任九旅参谋长，1920年10月，又任命刘伯承为五师主力第二混成旅一团团长。

刘伯承作战勇敢，他常对部下讲：“现国事垂危，人民倒悬，我恨不得扫尽贪官、污吏和他们的走狗。至于个人安危，自立志革命以来早已置之度外。”他的部下为他失去右眼感到惋惜，他却说：“脑壳落了都不怕，丢个眼睛算个啥哟！”刘伯承在战前必亲临第一线了解敌情，查看地形，甚至一个小土坡、一条干河沟都牢牢地记在脑子里。他常常是不思饮食，不顾疲劳，时常一整天都忘了吃饭。战斗一旦打响，他指挥若定，反而像无事一样，吩咐军需官：“快给我下碗挂面来，打几个鸡蛋。”熟悉刘伯承脾气的部下都知道，大凡此时指挥官已是胸有成竹了。

1921年，北洋军阀吴佩孚派其精

锐部队段其树旅进驻宜昌，准备入川。这时，熊克武已经辞职，但仍控制第一军，继任“川军各军总司令”的刘湘为达到其借北洋军之手消除第一军的目的，命令刘伯承率第二混成旅孤军驰援宜昌。刘伯承率第二混成旅赶到宜昌后，根据北洋军不善夜战的特点立即乘夜袭击段旅，并亲自带队冲入敌营同敌军展开夜战。双方激战一昼夜，北洋军溃败，刘伯承指挥盘破产，即令刘伯承率第二混成旅撤回下川东，与吴言和。

1922年7月，刘湘自以为羽翼已丰，便自称“四川靖难军总司令”，命第二军军长杨森率3万多人开赴川东，企图一举消灭第一军。第一军被迫撤至距重庆（南充）100多里的杜家岩。刘伯承闻讯后由成都赶到杜家岩任第一路军指挥官，组织部队乘夜向

第二军反击。黑暗中，第二军两个团不明地形，竟发生混战。刘伯承闻讯后抓住时机指挥部队攻入敌阵，获得胜利。第二天拂晓，熊军全面反攻，敌军大乱，刘伯承指挥一军穷追不舍，势如破竹，第二军在大竹虎耳岩刚建立的起防线也被攻破，一直败退到夔门。夔门有一处天险南天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杨森军据险死守。刘伯承亲临前线，率领部队仰攻。第二军官兵听说刘伯承打来了，顿时作鸟兽散，向夔府河边争渡，二军二师师长唐式遵抓了一块门板泗渡才逃脱性命。刘湘见大势已去，逃出重庆回到他的老家大邑县去了，杨森顺河东下，逃出四川，投靠了吴佩孚。

刘伯承在两次“下川东”战役中全歼北洋军段其树旅全部，重创刘湘的第二军，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很快以足智多谋、英勇善战成为第一军中举足轻重的青年将领。

（摘自2022年3月17日《人民政协报》）



投笔从戎的抗日英雄

马耀南

□ 袁军宝

在山东省淄博市经济开发区北郊镇北旺村，提起抗日英雄马耀南，村民都能讲出关于他的故事。每年都有干部、群众来到马耀南故居，缅怀这位抗日爱国英雄。
马耀南，1902年出生在山东省长山县北旺庄（今淄博市经济开发区北郊镇北旺村）。1930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学生时代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与进步同学一起组织反日会，到街头、农村宣传抗日救国，抵制日货。曾担任北洋大学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市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
1933年，马耀南任长山中学校长，秉持教育救国的理念。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万分愤慨。他在日记中写道：“全国已入血战状态，自顾尚在此安逸消闲，能不愧疚？”下定决心投入到抗战的洪流。鉴于马耀南的热忱抗日，中共山东省委在制订抗日武装起义计划时，将长山中学作为重要的据点，在该校成立了党小组，直属省委领导，一批中共党员在该校担任教员，培养训练抗日干部。其间，马耀南表示：“哀莫大于心死，苦莫过于国亡，愿尽自己力量，通过学生、教员发动抗战，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以教学改革的名义对课程进行调整，大量充实抗战救国的内容。又以办民众夜校的

名义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共产党人讲授军事、政治课。
1937年12月，马耀南参加黑铁山武装抗日起义，成立清河平原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在他的争取下，长山县保安大队也参加了起义部队。1938年6月，起义部队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后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马耀南任司令员。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率部与日军多次作战，围攻周村、破坏胶济路、坚守邹平城、激战刘家井子，重创敌人。
1939年7月22日，马耀南在桓台牛王庄战斗中遭敌伏击，壮烈殉国，时年37岁。在他的教育影响下，他的两个弟弟马晓云和马天民也参加了八路军，并先后在抗战中为国捐躯。
为纪念马耀南的功绩，渤海区党委曾将山东省长山县改名为“耀南县”，并成立了“耀南中学”和“耀南剧团”。
如今北旺村已是当地的富裕村，大多村民都住上了楼房。“马耀南同志爱国、报国的赤诚之心一直激励着我们，他不怕牺牲、一心为国为民的精神是我们村宝贵的财富。我们也将继续以此为动力，在全面奔小康、乡村振兴中努力拼搏、奋斗。”北旺村党支部书记白新勇说。
（摘自2018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